

忘我的战士

● 怀念林振夏同志



琳

编

忘我的战士

——怀念林振夏同志

宋 琳 编

一九九七年一月

目 录

他是我做新闻工作的引路人	
——纪念林振夏同志	林爱枝 1
怀念振夏同志	林 奔 8
公仆情操	高云方 11
高尚情操，无私奉献	
——缅怀振夏同志感人的二三事	林梦星 13
真正的共产党员	
——悼念林振夏同志	许培元 17
我随爸爸返故乡	林小端 20
“温温容止后生师”	
——浅谈林振夏《和萨上将〈道中吟〉》	林元伯 24
复旦校园里的战斗友谊	武振平 26
由两张相片想起的	
——怀念振夏师兄	黄纯初 29
永远向振夏同志学习	周瑞珍 34

驰骋论坛写华章

——与林振夏同志一起抓言论追忆 翁其华 36

对外宣传的开拓者

——悼念林振夏同志 张玉钟 42

与杂文事业同心同德

——追怀福建省杂文学会会长林振夏 祝文善 50

诲人不倦的兄长

——敬悼林振夏同志 李行钦 53

振夏同志为《科学与技术》专刊的栏目题名

徐言欢 59

“调查研究是办报的灵魂”

——深情怀念林振夏同志 郭宗华 61

林老关心后辈二三事

傅绍良 65

“赤足”终生

——怀念林振夏同志 傅开舒 68

信念

——缅怀恩师林振夏 朱开平 70

老林，你该慢些走……

——送别恩师林振夏 吴光辉 75

一瓣心香敬恩师

——怀念林振夏同志 吴文铿 78

附录

中共福建日报社委员会
福建日报社编辑委员会
沉痛悼念林振夏同志

89

林振夏遗体告别仪式在榕举行	92
挽联·唁电·唁函	95

振夏，我等你回来啊！（后记） 林慧庄 105

封面照片：林振夏同志在黄山（1990年）

黄种生摄影

封面设计

薛志华

他是我做新闻工作的引路人

——纪念林振夏同志

林爱枝

1970年9月，我调进了福建日报社。

我到总编室报到，是军代表大老王接待我。他当即拨通了一个电话，几分钟后，进来了一位老编辑，戴一副眼镜，很敦实。大老王把我介绍给他，他轻笑一下，说声：“欢迎！”声音那么沉，但很温和。这初次见面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握过手后，他便转身走出门去。大老王说：“跟上去啊！”我急忙快步跟上。出了门，走过两间房，进了一间办公室。只见他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拿起毛笔（红墨水的），在稿纸上写下一串名字递给我。尔后，走到门边的一张办公桌前坐下。

我拿着这张名单，逡巡着办公室的每个人，企图从他们的脸上，找出与姓名相似的特征来。然而，我还是对不上号。过一会儿，门口站着一位中年人，跟戴眼镜的那位老编辑搭讪着走到廊道上。

办公室里的人这才都冲着我笑。我急忙询问，才知带我进来的那位叫林振夏，是这个组的组长。我办公桌左边的那位叫江堤端，他热情地帮我把名字和人头对上了。当介绍我右边的那位同事时，左边远处的一位大声叫：“他是公鸡！”一片笑声。我初来

乍到的紧张心情也放松了。

就这样，我落了脚，成为福建日报社的一员。

二

第二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 50 周年、建国 22 周年。报社决定在全省组织一批典型报道，这个任务落在我们这个组。

老林召集大家开会，根据平常掌握的情况，进行研究、分析、筛选，最后确定了 12 个典型单位和个人，由 4 位编辑各负责 3 个典型的组织、编辑工作，我也负责 3 个。这任务着实吓了我一跳，心里忐忑不安，诚惶诚恐。我到报社几个月，编辑工作才起始。最初，我编辑的几篇学“老三篇”的小故事，还被人笑谑：“你怎么越编越长？”我暗想，现在哪敢担任典型报道的编辑！

但我又想，这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应该珍惜，不懂就问，争取完成任务。我紧张地工作起来，我只凭着勤奋、认真和负责，与地区、县报道组的同志们很好地配合采编。我负责的三个典型分别是长汀的德联大队、龙溪的后楼大队、厦门黄厝的党支部书记。前面两个大队，由报道组采写后到报社来，交老林先看，提出意见，再以“流水线”方式加工：先由报道组修改，然后交我编辑加工，再送老林审阅。很快地，这两个典型都见了报。黄厝的那篇却遇到了一些麻烦。在那个年代，于人于事常有争议，众说纷纭，对现实、对历史，可以随便怀疑、歪曲，要去核实、甄别，实在费时、费神。黄厝支部书记就属这一类，有人莫名其妙地、不断地提出一些细节来让你不断地去查核，为此我前后打了六七次电话。每次打完电话，我都及时向老林汇报。他十分耐心地听我唠叨——我把每句话都作为汇报材料——然后进行分析、甄别和判断，连文字如何表述才更达意更准确都作了指点。在他耐心帮助下，我第一次处理一批大稿，也就顺利地完成任务了。

三

1971年秋，林彪出逃、爆炸，震惊神州。事件发生后，如何把宣传跟上，使全国上下正确认识这一突发事变，成了新闻报道的重要课题。当时老林带了一个4人组成的记者组到莆田、仙游、平潭县采访。我也去了，我把它看成记者见习，十分用心学习。记得在莆田，是选定城郊公社，采访形式是组织一次有党员、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先向他们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然后由他们谈学习文件的体会、认识。结果，因派性原因，居然开不起全体党员会。面对这种现象，换个采访点是完全可以的。但老林不是这样做，他用了半天时间，分别找两派党员谈心做工作，开展别开生面的党性教育。当再次召集党员会议时，全体出席，在会上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评。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它使我感受到了一位党报记者鲜明的党性原则和强烈的责任感，他首先应考虑的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名党员记者，不能只是采访写作，更应该宣传党的政策，让党的政策武装党员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一个星期的采访工作中，都贯穿着老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在我19年编辑、记者的生涯中，老林这种精神令我铭记不忘，并潜移默化，使我时时不忘党报记者的神圣职责。因此，在我任记者处处长时，对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先同他们谈党报记者的党性要求。

四

在报社19年，其中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办专版，先是与吴声雅同志一道办《党的生活》专版，约一年时间。接着，独立办《革命妇女》专版。“四人帮”粉碎后，我又独立主办了《文艺评论》专版。前两个专版都是在老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在办

《党的生活》期间，我记忆最深的是如何在版面上体现坚持党性、反对派性，这在当时“文革”期间是很难做到的。老林不但要求我们坚持这个办刊宗旨，而且在具体工作中给予全力支持。我们反复地刊用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讲学习、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稿件，其中一些稿件正是在老林的直接指导下上了版面的。为此，老林不时地被无端指责，而他却泰然处之。

《革命妇女》专版由我单独主办。为了办好这个专版，使它发挥良好的作用，老林给予十分关注，从办版指导思想的考虑、创刊词的写作，到每期版面的安排，版样的设计，乃至每篇稿件的编辑，标题的制作都悉心指导。他告诉我，省妇联是全省妇女工作的领导机关，那里情况多，要多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还告诉我，要做好妇女工作，同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要从党委工作的角度去反映贯彻执行党对妇女工作政策的情况。他要求要多反映各界妇女在各自岗位上所争创的出色业绩，介绍各条战线领导关心和培养妇女干部的情况及其先进经验。他十分重视专版的头条（这也是福建日报办专版的好传统），要求多发典型，以提高专版质量。为此，在这个专版上，我们先后报道了惠安、福鼎、闽清、沙县县委及大量公社一级党委重视妇女工作的经验及成果，向全省推广。又先后报道了尤溪、建瓯、南靖等县的全省闻名的妇女耕山队，报道了连江的海上女轮机手以及其他一些“三八”班、组等。专版固定每月一期，几乎每一期都成为各级妇联、作业班组教育、学习的材料，在妇女群众中产生很大、很好的影响。这与老林帮助、指导是分不开的。

当我创办《文艺评论》专版时，老林已是报社一级领导，对这个专版他虽不能具体指教，但对办版方向他是时时关注的。记得在我接受办版任务后不久，我参加了全省一个文艺理论研讨会，会上的气氛使我吃惊，也使我忧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文艺

思想几乎一概否定，还冠之以“思想解放”。会后，我向老林作了汇报，他十分明确地讲：“党报文艺副刊就是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理论，这个旗帜要鲜明。”在具体办版方面他又讲两点：一是多评介与大众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文艺形式，如电影、电视、戏曲，因为这里有个引导欣赏的问题；二是多评介本省作者创作的成果。在4年多的办版过程中，老林的这些交代始终成为我工作的指导思想，不管文艺界风起云涌，今天一种观点，明天一种思潮，《文艺评论》专版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起哄、不随风，坚持自己的宗旨和特色，为文艺界所赞许。

五

我在福建日报社工作期间，不论老林是直接当我的组长，还是担任报社主要领导，不论是对我工作的直接领导，还是对我业务的间接指导，我都得益匪浅，毕生难忘。

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他表现出很强的党性原则，冷静地分析形势，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平稳地把握住办报方向。我记忆最深、最典型的莫过于1989年“六·四”前后对报纸的把握。当时，地处东南边陲的福建省，只能通过电视荧屏和人民日报了解首都情况，小道消息多如牛毛，一天数变，电稿奇缺，无法填满版面。一时间，办报陷入空前未有的困难。编委会有时一天碰头二三次，分析、研究这不正常的情况。老林十分着急，苦苦思考着如何对待这种“新情况”。但他处事十分冷静，确定编委会工作按常规进行，除非中央有新的精神。同时，加强地方稿件的组织。结果，福建日报在这场动乱中避免了差错，没有在全省产生误导的负面后果。另外，他还亲自交代编委及部分处长，要做青年学生的工作，做记者的工作，不要上街游行，还要做好青年学生到报社的来访接

待工作。正是根据老林的意见，每次学生去省府门口，我都一路跟着，同他们交谈，还尽量多地把他们带到福建日报社，一谈就是半天，或他们提问，或我尽力劝说，特别是谈“文革”中亲身经历的教训和体会。直至他们愉快地表示立即返校，我才放了心。

在我担任记者处处长时（前后有4年），记者队伍比较大，到1989年，有50人之多，并分散在全省9个地市。如何抓好这支队伍的建设，老林给予极大的关注。那几年，每年至少开一次全体记者会议，还要召开数次站长会议。几乎每次开会前，老林都听汇报，同我们一起研究会议议程，提出要达到的效果。对这支记者的作用他也十分看重，因为他们都在基层，都在第一线，要求他们主攻一版头条，主攻大新闻、重要新闻；每当新精神下来，有紧急报道任务时，也都要求布置到记者站去。在老林的关怀下，那几年记者处生气勃勃，大家比业务进步，比思想进步，上一版头条的逐年明显增多，入党的和要求入党的人也逐年增多，富有朝气，真正起了主力军作用。

老林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值得我终身学习。他一辈子从事新闻工作，如何办好报纸成了他终生不懈的追求。我听老报人说：“报社的领导应是首席记者”、“好记者是跑出来的”。我从老林身上体会到了这些话的丰富内涵。我跟老林出去采访不止一次两次，从旁看去，他的每一次采访都是一场调研活动，因而他能找到最恰当的新闻视角，提炼出比较高、比较深的新闻主题，达到比较好的宣传效果。我体会到这样的采访不单是对一个新闻线索的采访和报道，更是记者功底的积累。即使他自己没有直接参加采访，他也要对提到他面前的新闻线索，做到如临其境的询问和了解，提出采访的重要环节。记得1983年8月，我刚到福州记者站当站长，了解到市总工会组织职工开展读书活动，并从工厂抽调一些宣传骨干，组织了一支演讲团，辅导学习活动。老林听后，感到这是

一种很好的活动，很有宣传价值，要我进一步了解情况。之后，我向他汇报时，他十分详细地询问了工会如何组织，演讲团如何工作，其中有哪些人比较突出，演讲效果怎样，职工读书活动有哪些成果，哪些工厂开展比较好等等，又同我详细研究了采访方案，还要我一一采访演讲团的骨干。我按老林的指点，满城奔波，因为不巧，演讲团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后，刚刚解散，回到了各自的工厂。我就不得不冒着酷暑，骑着自行车去追踪他们，到第二化工厂、到省拖拉机厂、到纺织厂……写出的通讯刊登在一版头条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行新闻改革，成了老林经常考虑的问题，并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改革的措施，周末版的创办是十分生动的体现。记得当时我任总编辑助理，负责看几个版面，其中有《潮声》、《生活窗》，从组版到看大样，都参与了，这就有机会时常同老林一起研究、分析改革的形势、办版的思路。比如《潮声》，顾名思义，就是听取改革大潮中的回响。老林特别指出，办版的同志要有改革的思维，要用全新的视角去对待各种改革举措；既是改革，就含有探索的意思，不宜贸然、仓促下结论，可以组织一些讨论，去甄别得失；要大胆热情地报道一些勇于改革、开拓的人物；改革是广义的、全方位的，都要给予反映……回顾起来，应该说，这些周末版作为新闻改革是成功的，周末版深受读者欢迎，老林为此倾注了不少心血。

老林把毕生献给了党报事业，无私、真诚地敬业，热情、耐心地培养后继之人。他办了一辈子报，也辛勤笔耕了一辈子。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本文作者曾任福建日报编辑、处长、编委、总编助理，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长，现任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局长。）

怀念振夏同志

林 奔

振夏同志走得太匆促了！

他在住院的前天晚上，来到我的宿舍，送来经他修改的福建新闻“两会”开会的通知。他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认为不是一般的例会，因此加上“希望开成像中国记协理事会那样分量重、效果大的会议”等大段文字。那天晚上，他显得很疲劳，连坐都没坐就走了，万万没有料到，他竟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永远离开我们了！

6月15、16日，福建新闻“两会”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怀念振夏同志。岳峰同志建议全体起立，为他的逝世默哀。会议期间，讨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新闻队伍建设和筹建福建新闻人才基金会诸问题，我想到这些都是振夏同志生前最为关心的，同志们在发言中也多次提到他。会议结束时，仲莘同志动情地说：“振夏同志希望我们把这次会议开成分量重、效果大的会议，经过大家努力，他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振夏同志是不愿这么匆忙走的。他自知身体不好，离休以后，坚持早上锻炼、傍晚散步。他有一次跟我说：“我已经走过了福州城内的很多街巷。”就在他逝世前半个月，他的精神还很好，还和我们一起开了三次会，研究如何传达贯彻中国记协四届二次理事会精神。5月16日去省委宣传部汇报省记协工作，开完会回来，他

和我在省委大院散步。他看到院内绿树成荫，池塘水满，小径幽静，心情十分舒畅，说如果搬到屏山来住，早晚可以到这里呼吸新鲜空气。他曾经想到身体好些，要到祖国大西北看看，到省内各地市去走走。

振夏同志长期养成学习和思考的习惯。他患过视网膜脱落，所以离休以后，不敢多看书，但每天坚持读报，关心天下大事。他脑子里不停地思索，想的问题很多。想到经济建设问题，改革开放问题，党风民风问题，反腐败问题，等等。有一次，他从我那里看到省委党校社会科学信息中心编的《教研参考资料》，有很多理论文章，他就托我在省委党校工作的大女儿代订一份。又有一次，许一鸣同志在北京新华社开会的时候，亲自聆听到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讲到要树立忧患意识问题，在省记协学习会上作了传达，振夏同志因有事没有参加。后来他请我给他说一说，他听后感触很深。这些日子，他想写的文章很多，还想总结一下办报经验。我曾经劝他身体不好，文章少写一些。他说：“几十年写文章惯了，动脑筋惯了，想清楚了，写起来不觉得累。”他就是这样不停地思考，不停地笔耕，直到心脏停止跳动。

我和振夏同志是复旦大学同学，南下服务团战友，福建日报老同事。我们共事几十年，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们之间曾有三三次亲密的良好的合作。一次是在报社工作岗位上，我配合他抓经济改革的宣传，从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到工矿企业“松绑放权”的系列报道，我们一起研究情况，分析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组织宣传报道，至今留下难忘的回忆。另两次合作是离休以后，我们贡献余热，为省记协做点事情。在此同时，我们受福建日报社党委、编委的委托，帮助福建日报对外宣传处，为香港商报“福建专版”看稿。到他逝世为止，专版已经出了143期。

这中间，他以丰富的办报经验，运用于对外宣传，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逝世前曾建议召开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商量专版内容的改革。这个建议已被采纳，可他却不能出席发表真知灼见了！

这些日子，我的眼前一直出现振夏同志的音容笑貌，我不能把死亡和振夏同志连在一起。我想，他将活在我们的心中！

（原载《福建新闻界》1994年第6期。本文作者系原福建日报副总编辑，现任福建省新闻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公仆情操

高云方

两年前，林振夏同志刚刚去世时，我路遇福建日报社的黄敬林同志，他动情地告诉我，老林走时，真是家无余财，送行时报社想让他穿戴整齐一些，不料在他家里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黄敬林最后深情地说：“清官啊！老林真是个清官！”这句由衷之言，两年来常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引起许多回忆与联想……

振夏是我中学时的朋友，我们俩有着半个世纪的交情。他的为人，一向正直，不但洁身自好，还对各种腐败丑恶现象非常憎恨，常以杂文形式进行斗争，也鼓励我这样做。他曾对我直话直说：“你怎么搞的？写的文章倒不如50年代初期犀利了，为什么？”他这是明知故问。我们这些经历过“左”的年代以及十年浩劫的人，谁的脑子里不是重重叠叠地被“焊”上许多“封条”？我照实回答：“即使写这么平淡的东西，也总觉得半空中好像有一顶不可知的帽子在晃动……”他截住我的话说：“不会不会，现在强调民主与法制，再不会随意给人扣帽子了。眼前，从党中央到地方党委都很重视反腐防腐工作，你一辈子做纪检、监察工作，正该为反腐防腐呐喊助威。”他看到我还木然坐着，又进一步启发说：“其实，再干净的客厅，再美丽的花园，也需要经常打扫，我们杂文作者就要在打扫方面多下工夫。”振夏的这一席话，表明了他对腐败现象的憎恶，对廉政建设的关心，也是对我的指导与要求，十

年来我一直铭记在心。

振夏原是福建日报总编辑，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官了，但他却很厌恶官气。有一次几位老同学小聚，扯起官场气派来，振夏说他很欣赏“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句歌词。他说，世上哪有天生的官，还不都是来自老百姓；一个老百姓之所以能够变为一个官，是因为人民给了他权力，以便让他诚诚实实在在地替国家替人民服务，现在少数干部一有权便忘乎所以，搞特权耍威风，这种人可以说他多少有些蜕化忘本了。他引用唐朝蒋贻恭的《咏金剛》诗：“扬眉斗目恶精神，捏合将来恰似真。刚被时流借拳势，不知自身是泥人。”他说，少数妄自尊大、作威作福的官儿，恰似这种“扬眉斗目”的泥金剛，别看他威风凛凛，好像法力无边，其实庸俗浅薄，不过只是一尊泥巴捏合的泥人而已。振夏自己就是一个不摆官架子的人，我曾几次因联系工作到他的办公室，只见进来谈工作的报社同志无论年长的或年轻的，都直呼他“老林”，彼此看不到一点上司与下属的拘束。有一位曾在该报工作过的同志由衷地说：“福建日报社最好，只有同志，没有官。”可见我的感觉不差。

“政声人去后”。振夏同志虽然走了，但他的公仆情操依然活在同志和朋友心中。

（原载《福建日报》1996年5月24日。本文作者原系中共福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现离休。）